

# 戰爭歷史之無意識召喚與記憶再現 ——從精神分析論《睡眠的航線》中的創傷敘事

陳秀玲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生

## 提 要

《睡眠的航線》為一部關於戰爭創傷記憶的小說，吳明益身為戰後世代作家，選擇從家族史書寫出發，從敘事者「我」的觀點為主要線軸，穿插全知觀點之父親戰爭經歷，並加入菩薩心象、烏龜夢境、植物生態、靈體乙等「非人」視角，分別從現實處境、歷史經驗和超現實觀點，透過文學形式重新檢視戰爭對人類生命的衝擊。本文試圖從精神分析視角切入，將小說分為三條敘事主軸，分別從佛洛伊德的「超越享樂原則」探索父親戰爭記憶的心理創傷，並延伸《摩西與一神教》的歷史／民族創傷概念，將「我」的個體精神困境，放置父輩之群體心理情境中進行理解，從無意識層面探討戰爭記憶的潛伏與再現。再者，參照凱西·卡露詩所提出「存活之謎」，梳理死亡、夢境與無意識大海之串流意象，詮釋「我」得以在夢裡與父親的經歷相遇，進而理解戰爭投射在父親記憶中的矛盾與傷痛。最後從小說展示之宗教觀和生態意識，立論作者從「生命延續」的觀點書寫戰爭歷史，透過因存活下來而無可避免的創傷記憶，逼視人類發動戰爭的荒謬本質。

**關鍵詞：**吳明益 睡眠的航線 創傷敘事 精神分析 無意識

# 戰爭歷史之無意識召喚與記憶再現

## ——從精神分析論《睡眠的航線》中的創傷敘事

陳秀玲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生

### 一、前言

吳明益自 1997 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至今已累計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散文集、攝影文集以及學術論文集等十餘部作品。本文進行討論作家第一部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是一部結合生態、歷史、戰爭和記憶的「大器」作品，<sup>①</sup>小說從「包籜矢竹」開花和死亡並行的特殊景觀開始，以東南亞大海嘯造成大量傷亡的災難新聞作結，中間穿插父親三郎參與太平洋戰爭的少年史，以及敘事者「我」為解決睡眠異常而不斷諮商專業醫師的過程。從吳明益系列作品中不難察覺，人文思想與自然生態之間的關係是作家長期經營的議題，尤其展現在長篇小說的敘事結構上，生態意識通常被作為貫穿多線敘事的核心思維，如此表現手法在《睡眠的航線》（2007）明顯看到作家以竹子、水草、烏龜等物種作為時序、記憶與夢境的隱喻。

綜觀目前學界對吳明益作品的研究成果，無論是碩、博士學位專論或學術期刊論文，多數聚焦在作家專執自然人文、夢境書寫、歷史記憶和宗教信仰為創作核心進行分析。其中黃宗潔針對《睡眠的航線》發表專論，從生態、夢境與記憶

---

① 邱貴芬：〈面對浩劫的存活之道：閱讀吳明益《睡眠的航線》〉，《睡眠的航線》（臺北：二魚文化，2007 年），頁 14。作者在序文中寫下：「這是台灣小說裡難得見到的『大器』」。

三個面向，論述小說中「非人界」所展示的生態意識，以及「人」的睡眠與夢境所召喚出一段壓抑與失憶的歷史記憶，立論作家結合「生態書寫」與「歷史記憶」書寫家族史的獨特航道。<sup>②</sup>黃氏廣引國內外研究戰爭記憶創傷的相關論述及文本，從文學、歷史觀、生物學和心理學等多元視角進行詮釋，主張吳明益不曾親身參與歷史現場，因而藉由夢境書寫修補戰爭記憶的空缺，甚至創造新記憶的可能性。本文試圖從黃氏精闢的論述中，拉出一條心理學的專徑，回到佛洛伊德晚期致力發展個體戰爭創傷心理，以及猶太民族集體創傷記憶的理論原點，深論《睡眠的航線》中關於夢境、生態、神言和無意識等超現實情境所投射出的心理真實。

本文進入論述之前首先提問的是，作為戰後出生的新世代作家，吳明益如何再現超過半個世紀之遙、遠遠溢出個人經驗的戰爭記憶？朱惠足在論述二戰記憶書寫時，亦提出新世代作家均非實際的戰爭體驗者，主張「戰爭記憶不只是過去經驗與事件的如實再現，而是透過當下的政治立場與歷史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角度，進行重新詮釋與定位。」<sup>③</sup>吳明益企圖呈現的，正是戰後新世代看待歷史的視角與態度，如後記所言：「這本書並不在寫一段歷史，而是其他的一些什麼的。當小說完成的一刻，我才隱約地知道那是什麼。」<sup>④</sup>作者最終沒說出隱約知道的究竟是什麼，從小說大量使用記憶回溯、夢境、非人界等超現實視角拼貼歷史真相的敘事手法，卻引發本文嘗試從精神分析視角，進入人類無意識（unconsciousness）層面，深觸小說人物的心靈世界，探討作者如何透過文學敘事再現跨時空的戰爭記憶，並在書寫中不斷與歷史創傷進行協商的心理過程。

本文將採用精神分析方法，將父親的失語與兒子的睡眠異常，視為一種心理創傷的症狀表現，推演父親深陷戰爭記憶的內心獨白，以及敘事者「我」為尋求療癒而展開的諮詢旅程，就如同進入一場精神分析式的療程，在不斷回溯與敘事過程中打開記憶迴路，將壓抑並潛伏在無意識裡的戰爭記憶，經由世代的「延宕」

---

② 黃宗潔：〈遠方的戰爭：論《睡眠的航線》中的生態、夢境與記憶〉，《東華漢學》第13期（2011年6月），頁173-194。

③ 朱惠足：〈從「戰爭的記憶」到「記憶的戰爭」：宋澤萊、陳映真與目取真俊的二戰記憶書寫〉，《文化研究》第十二期（2011年6月），頁18。

④ 吳明益：〈後記〉，《睡眠的航線》，頁304。

與「再現」，重新賦予歷史事件新的詮釋與理解。首先從佛洛伊德的「超越享樂原則」理論，<sup>⑤</sup>分析父親三郎因戰後精神創傷所引發之強迫性重覆（compulsion to repeat）症狀，並藉由《摩西與一神教》中的歷史／民族創傷概念，試圖將個體創傷放置歷史情境中進行深論，從「無意識」層面爬梳歷史記憶如何透過夢境對敘事者「我」進行召喚，進而詮釋小說中父親記憶如何潛伏在敘事者「我」身上，成為內在心靈無法切割的戰爭創傷。再者，延伸凱特·卡露詩（Cathy Caruth）<sup>⑥</sup>提出之「存活之謎」（enigma of survival），探討創傷主體藉由死亡夢境再次經歷「存活下來」的真實感，並在夢與夢的串流、套疊中，揭開戰爭投射在不同世代心靈的創傷圖像。最後從生態意識和宗教觀，探討作者企圖從自然現象重新定義存活與死亡，並從神的疆界靈視戰爭與生命，呈現戰後世代對戰爭歷史的獨特觀看視角。

## 二、從「失語」到「失蹤」——父親的戰爭記憶

《睡眠的航線》是一部關於戰爭創傷記憶的小說，吳明益身為戰後世代作家，選擇從書寫家族史出發，透過敘事者「我」的視角，慢慢拼湊出父親的形象。「我」記憶中的父親是一位患有嚴重耳鳴，活在自己安靜世界裡的孤獨者，父親的無聲造成父子間的無言，也意喻著世代之間的歷史斷裂。陳芳明認為此部小說是作者「嘗試把生態、歷史、記憶揉雜起來，凝視台灣社會潛藏許久的創傷」，<sup>⑦</sup>並且以寓言的方式表達「戰後世代都焦慮地展開『尋父』的旅程，這種歷史意識的覺醒可能是曲折而迂迴，卻是一種心靈治療僅有的方式。」<sup>⑧</sup>論者指出作者之創作意圖在於打開記憶的傷口，唯有透過歷史意識的覺醒才能達到心靈療癒的效果，

---

⑤ Sigmund Freud, "The Freud Reader: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W. W. Norton & Co Inc., 1995), pp. 594-626.

⑥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Traumatic Departures: Survival and history in Freu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7-72.

⑦ 陳芳明：〈歷史如夢——序吳明益《睡眠的航線》〉，《睡眠的航線》，頁4。

⑧ 同前註，頁9。

文中所言「曲折而迂迴」的過程，著實適予精神分析式的詮釋方法，在不斷召喚、回溯與解析的心理體療程中，重新面對創傷、予以新的理解，進而達到療癒的可能性。

對於日治時期台灣赴日少年工的戰爭歷史，吳明益在小說中選擇從第三人稱全知觀點，透過三郎的記憶回溯戰爭經驗，當年的心境在相隔多年的時空中，反倒呈現出客觀的抽離情感。由此可知，吳明益並不直接讓參戰主體訴說戰爭創傷，而是表現在敘事者「我」所描述的父親形象中。小說中三郎是一位不會說故事的父親，中年後便以一種嚴厲、孤獨、沉默的姿態背向現實世界，乃至於最後徹底失蹤成謎。戰後少年三郎平安從日本返台，婚後靠著日本兵工廠的技術訓練，在中華商場經營一家電器修理行，展開一段太平歲月裡的平凡人生。然而，敘事者「我」的記憶中，父親卻因日益嚴重的耳鳴而無法正常與外界溝通：

你心裡認為不是自己聽不到聲音，而是聽到太多聲音，因此無法清楚地分出哪一個聲音是現實的，哪一個是夢境或是記憶裡的。（頁 82）<sup>9</sup>

自己已經老到沒辦法拒絕耳鳴也沒辦法再拒絕回憶，身體的衰弱帶動意志的衰弱，回憶與耳鳴都有了自己的意志，完全不聽指揮，連精神都沒辦法集中超過五分鐘，一旦集中力散去，就會讓一些東西跑進來。你老了，它們蓬勃了。（頁 88）

敘事者「我」感受到父親活在一個現實與記憶混淆不清的世界裡，更多時候耳鳴成爲一種召喚，將父親帶回遠方的少年記憶。除了敘事者「我」對父親的描述，吳明益亦透過三郎的回憶予以應證：「長時間操作空氣鎚的結果是除了有節奏的空氣爆擊聲外，完全都聽不到其它的聲音，就好像耳聾了一樣，有時甚至連口令都聽不見。」（頁 141）說明三郎的耳鳴是來自兵工廠的職業傷害，戰爭時期所留下的身體傷害，導致日後的溝通障礙，乃至於失語的心理症狀，如此從身體到心

---

<sup>9</sup> 本文所有引文自《睡眠的航線》之文句段落，皆簡要以標示頁碼的方式呈現。

理的的病史串連，正是佛洛伊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展因戰爭引發「強迫性精神官能症」<sup>⑩</sup>的著力點。

佛洛伊德強調精神分析的起點在於個別症狀的外在形式和內容，主張症狀具有某種心理上的意義，並將心理領域所引發的症狀稱之為「精神官能症」，其症狀來自無意識的支配影響。<sup>⑪</sup>也就是說患者無法意識和控制這股力量的執行，因而陷入一種「強迫性精神官能症」的行為模式，並在常態生活中無意識地進行著。佛氏觀察到患者的強迫性行為，通常是針對某個重要場景的一種表現和重複，「患者所能做的僅僅是：置換和交換，用另一種比較溫和的意念替代原來那個愚蠢的意念……」。這種將症狀置換到其原來形式無關的某個東西上的能力構成了患者疾病的主要特徵之一」。<sup>⑫</sup>根據佛氏之理論視角觀察三郎行為模式，「耳鳴」無疑是來自戰爭時期的身體傷害，「沉默」則為一種心理層面的症狀表現，並持續存在常態生活中，因此「失語」可理解為對戰爭記憶的一種置換——用沉默截斷創傷記憶流入現實世界的可能性。對此，佛氏特別針對戰爭所引發之「創傷性精神官能症」進一步說明：

在創傷性精神官能症中，尤其是在那些由戰爭的恐怖而引起的創傷性精神官能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自我的利己動機，它尋求保護與利益——這種動機本身不足以致病，但一旦疾病已經發生，則會得到它的贊同和維護。<sup>⑬</sup>

---

⑩ Sigmund Freud, "The Freud Reader: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p.594。佛洛伊德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提出「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理論，與過去以臨床經驗做為理論基礎的建構方式大不相同，他引用一些「例證材料」（case material）像是飽受戰爭神經症（war neuroses）之苦的退伍軍人，作為發展「強迫性重複」（compulsion to repeat）概念之具體實例。

⑪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彭舜譯：《精神分析引論》（臺北：左岸文化，2010年），頁316。

⑫ 同前註，頁319。

⑬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彭舜譯：《精神分析引論》，頁462。



佛氏企圖深化患者透過「置換」來掩蓋原先愚蠢意念的行為概念，進一步提出「形成症狀」也可能是自我為避免內在衝突所啟動的一種保護機制，也就是說患者在某些情況下會選擇用精神官能症來解決衝突，因為那是一種最無害且被社會所容許的方法。

如小說中三郎拒絕改善耳鳴症狀時所言：「戴助聽器？花那個錢幹什麼？反正也不害事」（頁 82），再者，敘事者「我」回憶商場拆除前一天，「父親罕見地談起他到商場的歷史，用他那上了年紀，沾滿灰塵的喉嚨」（頁 243）說完隔天父親便失蹤了。說明其實三郎並不全然失去語言功能，當他開口說了最長話的一次，故事裡仍抽離少年時期的日本經驗，很明顯三郎不願意說出那一段歷史，也可能是無意識逃避戰爭記憶。無論如何都足以說明父親選擇留在耳鳴的狀態裡，從精神分析角度來看，那正好提供三郎維持沉默的最好理由，也就是說，沉默其實不是一種結果，而是讓疾病存在的原因，唯有如此才得以安全封存那些不堪回首的創傷記憶。

如前所述，吳明益並不刻意藉由三郎控訴戰爭創傷，而是繞道進入三郎的回憶裡，鋪展台灣少年到日本參與製造武器的經歷，畫面中極少展現戰場上烽火連天、血肉相搏的殘酷暴行，大多是一幕幕少年三郎時而思親、時而徬徨的懵懂心境，以及與台、日同袍之間的情誼和別離。儘管如此，小說以老年三郎的回憶進行歷史堆疊的敘事，此一方式至少揭露兩個心理層面的意義，其一、創傷記憶如影隨形；其二、創傷經驗的固著（fixated to his trauma）。<sup>14</sup>此外，敘事者「我」

---

<sup>14</sup> Sigmund Freud, "The Freud Reader: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p.598。佛洛伊德首先對恐懼（fear）、焦慮（anxiety）和驚恐（fright）進行區分，立論「恐懼」通常針對某一特定對象，「焦慮」是為預期某種危險所做的心理準備，「驚恐」則指向主體在毫無防備情況下遭受巨大衝擊。唯有「驚恐」才會導致創傷神經症（traumatic neuroses），並主張透過夢的解析進一步理解患者的心理運作過程，認為創傷神經症患者夢境的特性為：「它不斷地把病人帶回到他遭受災難的情境中去，由此在重新經受驚恐之後，他驚醒過來。這個事實所引起的驚嚇比實際應受的驚嚇少」。佛氏對於夢者一再重返創傷現場的情境，稱之為創傷的固著（fixated to his trauma），認為此一精神固著並不適用夢是一種慾望的實現，而是獨立於「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之外。

眼中的沉默父親形象，表面上是出自耳鳴的影響，然而透過作家刻意穿插三郎的少年回憶錄，兩相對照後便可浮現三郎因戰爭所導致的身體疾病和心理創傷。美國精神學家珊卓·勃倫（Sandra L. Bloom）<sup>15</sup>從現代醫學觀點闡釋心理創傷（Psychological Trauma）的定義，提出造成心理疾病並非創傷本身，而是個體以獨特的方式對創傷經驗做出身體及心理的反應。作者說明創傷主體往往被恐懼淹沒，因而喪失將經驗訴諸語言的能力，然而精神治療的重點就在於患者將創傷經驗轉換成敘述（narrative），主張唯有經由話語與自己和他人分享，患者才能清楚意識到事件發生的時序——過去、現在與未來，換句話說，語言可以讓創傷經驗安全地停留在屬於它的過去，而非存在「永遠在場的當下」（ever present “Now”）。

珊卓以現代精神醫學的角度論述創傷，從佛洛伊德所建構的精神分析理論中，繼續拓展出一套符合現代心理疾病尋求療癒的方法，顯然語言功能是論者闡述的著力點，並以莎士比亞戲劇為例，認為瞭解「創傷再現」（Traumatic Reenactment）的最佳方式便是透過戲劇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drama）。《睡眠的航線》從現代社會情境探討父輩之戰爭經驗，提供戰後世代透過文學作品重新認識歷史，並在參戰主體的創傷再現裡，進一步省思戰爭與生命的辯證關係，如此藉由文學形式的再現過程，其實也是一種療癒過程，讓戰爭創傷得以透過文字被敘述，讓社會重新檢視歷史的真相與意義。從文學象徵意涵來看，三郎日益嚴重的耳鳴和沉默，意味著戰爭的暴力和溝通斷裂，三郎的失蹤更影射歷史記憶的消逝，然而吳明益並不以此為結，他在小說末了讓三郎現身／聲在 1991 年的日本大和，五十年後重返歷史現場的當下，三郎自省自己「確實參與了殺戮」，對於戰爭中的正義與罪惡、保衛與殺戮，內心仍糾纏著自我道德審判，透露出參戰者內心始終無法被清理乾淨的創傷：

我既不認為自己有罪，也不認為自己無罪。所謂有罪和無罪這回事，在戰爭裡是最難認定的。戰爭中不義的、殘酷的、不可思議數量的死亡，有時

---

<sup>15</sup> Sandra L. Bloom, “Trauma Theory Abbreviated. 1999.”, 網站：（[http://www.sanctuaryweb.com/PDFs\\_new/Bloom%20Trauma%20Theory%20Abbreviated.pdf](http://www.sanctuaryweb.com/PDFs_new/Bloom%20Trauma%20Theory%20Abbreviated.pdf)）（檢索日期：2015 年 1 月 16 日）。



讓人感到非現實性，就好像是看到畫中的死亡一樣。（頁 292）

三郎代表參戰者的歷史記憶，敘事者「我」則承接父親的創傷，並在尋求療癒的過程中重新參與父親的生命史，意味著歷史雖已隨時間遠颺，創傷卻頑強地固著在幾世代台灣人的情感中。文中三郎至終無法真正擺脫戰爭陰影，作家巧妙安排敘事者「我」為治療睡眠問題，遠赴日本造訪心理諮商師，因而意外重回父親經歷戰爭的時空現場。吳明益企圖潛入更深層的集體無意識，從心靈層面探索父史真相，並過透夢的召喚、疊映與暗示，引領「我」一步一步走進父親的記憶，讓歷史創傷得以被戰後世代所理解，進而從內心慢慢清理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傷痛餘痕。

### 三、歷史記憶的召喚與重返——「我」的精神療癒旅程

吳明益在《睡眠的航線》中從敘事者「我」的視角進入父親戰爭記憶的回溯旅程，展演父子兩個世代從二戰事件中承受各自的心理創傷。首先，父親三郎作為參戰主體，他的不斷回憶和沉默失語，代表著深陷其中且無以名狀的極度壓抑，他的失蹤更揭示戰爭創傷對於歷劫歸來的生還者而言，是無法被言說且治癒的可能性。再者，戰爭暴力加諸在父親身上的創傷，因「失語」造成親子之間無法溝通的裂口，在兒子「我」內心投下一道深長的成長陰影。直到「我」經歷一場突如其來的睡眠異常，意外踏上父親歷史的尋根之旅，重返日本二戰時期兵工廠原址，其間透過閱讀歷史資料填補父親少年時期的經歷，也在不斷追尋夢境意義的過程中，理解戰爭在父親乃至於人類身上所造成難以修復的傷害，進而療癒自己在親情和愛情上的精神困境。由此《睡眠的航線》企圖呈現的，便是傳達戰爭帶給人類最大的傷害，莫過於精神創傷並不會隨著戰爭結束而終止，也不會因記憶斷裂而消失，而以另一種心理症狀重複表現在常態生活中，且無意識地世代傳承下去。

小說一開始藉由包籐矢竹「幾十年才出現一次的竹子集體性交兼死亡的盛會」（頁 22），帶出植物為繁衍而啟動的生存機制：

竹子開花是一種「植物的遷徙策略」，竹子藉開花來讓風帶他們「離開這裡」，把族群更廣泛地散播出去。但是難道竹子也有意志嗎？沙子說不是的，應該要這麼想：竹子不是一根根竹子，個別的竹子比較像是一個巨大生命中的一個器官，因此一叢竹子死掉不是什麼重要的事，重要的是讓同種的其它竹子可以求生。（頁 22）

筆者以為作家書寫竹子的生態奇觀，實為展現一種觀看戰爭歷史的獨特視角，也就是把「個體」視為「人類總體」的一部份，說明個體存在的意義在於整體生命的延續。再者，強調個別竹子本身並沒意志，而是隨著千里之外「原來的母竹林同時開花」（頁 21），以上敘述透露出一種精神分析式的思維，表明人類無意識對個體心靈的支配影響力。佛洛伊德於一戰後以生還士兵反覆夢到戰爭場景為分析個案，進一步提出「典型症狀」這個集體性概念，主張各種強迫性重複症狀的意義，除了與患者經歷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之外，「各種典型症狀當然也可能可以追溯到某種本身就很典型的經歷——人類所共有的經歷。」<sup>16</sup>佛氏戰後致力將精神分析由個體心理學導向群體心理學研究，此一企圖心實踐於 1939 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完成之《摩西與一神教》。佛氏在書中發表個體心理生活中還包括出生時就存在的經驗，立論其具有種族發展起源的成分，存在於某些「天生的」稟性之中，稱之為「古代的遺產」。並進一步大膽提出「人類的古代遺產不僅包括稟性，而且包括主題——即前輩們經驗的記憶痕跡。」<sup>17</sup>也就是說，生命本身除了存在內建的物理機制，還保留了祖先所記憶的心理遺產，此一論點奠定佛氏「在個體心理學與群體心理學之間的鴻溝上建立起了一座橋樑」的基座，<sup>18</sup>其目的在於從個體神經症患者身上，延伸對民族（猶太民族）群體的創傷心理分析。

佛氏在《摩西與一神教》重新召喚猶太人殺死摩西／父親的歷史傳說，試圖

---

<sup>16</sup>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彭舜譯：《精神分析引論》，頁 332。

<sup>17</sup>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楊韶剛譯：《一個幻覺的未來：摩西與一神教》（新北市：知書房，2001 年），頁 219。

<sup>18</sup> 同前註，頁 220。

解釋長久以來被掩蓋和壓抑的記憶，在數世紀的發展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強烈，乃至於對該民族的思想、行為乃至於命運，皆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力。<sup>19</sup>佛氏此一論點提供筆者思考將《睡眠的航線》中敘事者「我」之個體精神困境，放置父親戰爭記憶所代表之群體心理情境中進行詮釋，探討前輩經驗的記憶痕跡如何透過心理過程，召喚戰後世代踏上真相追尋之旅？再者，敘事者「我」如何在無意識牽動下重新經歷父親的少年記憶？佛氏主張應視宗教現象為群體心理學的一部分，並根據創傷性神經症患者身上呈現的「事故和第一次出現這些症狀之間經過的那段時間被描述為『潛伏期』」<sup>20</sup>之特點，結合猶太民族的宗教創傷記憶，提出神經症發展的公式：早期創傷——防禦作用——潛伏期——神經症發作——被壓抑事物的部分回歸。<sup>21</sup>佛氏企圖將民族歷史創傷納入創傷性神經症的研究範疇，為本文開啓一個從精神分析詮釋文本的視角，將敘事者「我」突然進入睡眠異常狀態視為心理症狀的發作，並將重返歷史現場理解為無意識的召喚，引領「我」回到原始場景重新體驗父親的創傷，讓斷裂的記憶重新接軌，唯有如此，「我」才得以回到生活正常軌道上繼續前進。

小說中「我」在觀賞竹子集體開花後陷入睡眠異常，據描述「既不是失眠也不是猝睡，只是睡眠的起始線一邊倒退，一邊延長，想睡的這端無法抗拒，該醒的那一端也無法掌握，就好像駛進一個巨大的睡眠海洋一樣。」（頁 30）引文中

<sup>19</sup> 同前註，頁 186-187。佛洛伊德在《摩西與一神教》中一再聲稱猶太人殺害摩西的事實，認為官方歷史學家有意否認那些事實和觀念，然而摩西的宗教並沒有不留痕跡地消失，對它的某種記憶仍然活生生地保留著——這是一種可能被掩蓋和歪曲的傳說，卻逐漸在人民心理上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力。並且終於成功地把耶和華變成了摩西神，復活了早在數世紀之前被引進，後來又被放棄的摩西宗教。

<sup>20</sup> 同前註，頁 185。

<sup>21</sup> 同前註，頁 199。佛洛伊德認為猶太民族長期以來企圖遺忘謀殺摩西的歷史創傷，在「防禦性反應」（defensive reactions）的作用下透過「迴避」（avoidances）進入潛伏期。在佛氏的詮釋裡，消極迴避其實也是一種對創傷的固著，且往往引起內心的矛盾衝突而引發神經症狀，因此在對創傷的第一次反應和以後疾病的發作之間的神經症潛伏期現象，必須被看做是典型的。後來發生的這種疾病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種想要治癒的努力——看做是力圖再次與被創傷的影響所分裂的那些自我的部分進行和解，並把它們結合成為一個與外部世界相應的強大整體。

「睡眠海洋」以精神分析語言來說，可以理解為無意識大海，透露出作家企圖從心理學（文本中指向佛洛伊德）作為《睡眠的航線》的創作意識。「我」一開始失去駕馭睡眠時間的能力，同時也詭異地掉入「無夢」狀態，文中宗醫師嘗試用各種現代心理學名詞進行解釋，像是「全日夜節奏」（circadian rhythm）和「睡眠呼吸中止」（apnea）等生理現象，並認為夢的意義為大腦同步進行「記憶」與「遺忘」的過程，他從科學立場直言佛洛伊德誤解夢的意義，強調「我們很難從混亂的夢境裡解釋出清楚的理由，是因為夢本身大部分跟真實無關，而是大量的情緒跟象徵符號」（頁 95）。話雖如此，宗醫師仍然對「我」的無夢感到困擾，畢竟少了夢境的依據，電波脈衝圖也只是一些沒有意義的線條。最終「我」的諮詢療程因「無夢」而宣告無效，宗醫師於是介紹「我」至日本求診白鳥醫師，而事實上在赴日之前，「我」的作夢功能已悄悄回復。小說行文至此，吳明益巧妙安排兩個事因讓敘事者「我」踏上父親的記憶旅程，其一、「我」發生睡眠問題這段時間裡大量閱讀二戰歷史；其二、白鳥醫師的住所在大和市，也就是三郎少年時期的兵工廠原址。作者刻意安排一趟表面上看似為解決「我」的睡眠問題而展開的治療旅程，事實上也是一趟重返戰爭歷史的召喚之旅，旅程中，「我」在無意識裡與父親的記憶疊合。

作者安排「我」在抵達大和市的前幾天，睡眠問題在一場意外昏倒事件中不藥而癒，地點就在一座名為「野鳥之森」的森林公園裡。在此章節之前，作者從第三人稱描述一群少年行走在森林裡，突然一陣氣爆聲響，其中一位少年的影子站了起來：「少年喚過一遍同伴的名字後，在意識恍惚中決定往火光的地方走，當他看見黑暗中的微細火光逐漸變大，不禁哭了起來。」（頁 200）從作者刻意安排前後章節的森林場景，無疑暗示「我」與二戰時期的父親在同一座森林，各自經歷了一場屬於自己的意外事件，共同點是他們都幸運地存活下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我」從陷入睡眠異常開始進入「無夢」狀態，並在踏上日本之前無預警恢復「做夢」；接下來「我」在森林經歷短暫昏迷，醒來後意外發現已擺脫黑暗的睡眠洞穴。也就是說，從症狀開始到結束像是一場自發性的意外串連，「我」在寄給女友阿莉思的信中如此闡述：

對了，我的睡眠「正常」了呢。不曉得為什麼，它「正常」了。雖然白鳥醫生為我解釋了很多關於睡眠的科學解釋，但我的感覺卻比較像是某個力量（我不願意說那個字）把我的睡眠開關扳到一個新的、莫名其妙的規律上去，有一天它又心血來潮地將它扳回來一樣。（頁 255）

引文中不願說出的「某個力量」，是一個開放的空格，或許可以輕而易舉地填入「神」這個字，然而筆者以為作家企圖呈現的，應該是來自心靈世界更深層的無意識召喚。吳明益藉由白鳥醫師對「夢」進行文學性的詮釋：「我相信莎士比亞說的，我們是用與我們的夢相同的材料做成的，完全擺脫集體潛意識跟自己的人生經驗的人並不存在，同樣地，那樣的夢也不存在。」（頁 219-220）說明「個體」無法抽離集體無意識單獨存在，即便你、我和作者都是未曾參與戰爭的世代，歷史記憶仍蹲踞在無意識裡伺機而動，這無疑是《睡眠的航線》透過「我」這個角色所要傳達的訊息。

#### 四、夢與夢之間：戰爭陰影之無意識投射

本文採取精神分析視角進行文本詮釋，除了無意識召喚所展開的心理療癒旅程，還有一個更為顯著的著力點便是「夢境」書寫。吳明益從少年三郎身歷戰爭現場的夢、「石頭」（烏龜的名字）潛入人類夢境的夢，到敘事者「我」對夢意義的探索，以虛實交錯、拼貼與疊合的方式鋪排章節，《睡眠的航線》無疑是一部用夢境建構而成的創傷記憶小說。黃宗潔從「修補戰爭記憶空缺」的觀點，主張「夢境在這場戰爭與災難敘事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自然是解讀《睡眠的航線》最為關鍵的部分之一」，<sup>22</sup>文中援引佛洛伊德立論「再壓抑的記憶都有可能透過夢境的敘述而回返」的概念，詮釋作者藉由夢境填補父輩記憶的書寫策略，並延伸猶太人經歷大屠殺後「無法被敘述」的心理特質，將戰爭創傷的「無能敘述」困境作為敘述者「我」「無夢」症狀的隱喻。

---

<sup>22</sup> 黃宗潔：〈遠方的戰爭：論《睡眠的航線》中的生態、夢境與記憶〉，頁 175。



將夢境作為填補斷裂記憶的書寫策略，是小說中顯而易見為打破單一歷史論述的創作意圖，本文的研究旨趣在於「夢境」通常被作家用來呈現幽微曖昧的內心世界，在精神分析領域裡更被視為探觸人類無意識的唯一途徑。吳明益將夢境作為敘事主軸，除了技術性將虛幻夢境賦予真實世界意義之外，背後是否蘊藏更深層的心理意涵？尤其當《睡眠的航線》裡的「夢境」經常是溢出個人實際生活經驗，甚至是以進入他人夢境的方式打開歷史記憶，夢境書寫於是乎也觸及對人類集體無意識的探索。針對夢境與集體無意識的連結，本文嘗試從凱西·卡露詩（Cathy Caruth）的現代精神醫學觀點，回到佛洛伊德建構戰爭創傷的理論原點，從人類的本能機制詮釋「夢」在創傷敘事中延伸而出的深層心理意涵，進而從無意識觀點解析作家如何藉由夢的流動串連兩代之間的記憶，並讓斷裂記憶在「夢中夢」與歷史真相接軌。

### （一）死亡夢境與存活之謎

吳明益從少年三郎的夢開始進入記憶航道，描述三郎搭上船後夢見搖晃的陸地，那時他與來自鄰鎮的秀男同床：

船艙裡三百多個少年在搖晃中陸續進入睡眠，有的很快閉起眼睡著，有的睜著眼直到天亮，有的做著夢並且一輩子再也忘不了這夜的夢境。夢從一個沉睡的少年的身上，靜靜移動腳步到另一個沉睡的少年身上，夢在這裡，在那裡猶疑、徘徊不去，帶來新的記憶，新的想像，新的恐懼，新的傷害與新的遺忘。（頁 45）

作者從航行的搖晃帶出夢的流動意象，以相當文學性的表現手法呈現夢穿梭於虛幻與現實之間，夢裡的一切或許不算數，但醒來後卻成為記憶的一部份，並且帶來新的恐懼與創傷。另外一則夢是在日本工廠宿舍中，三郎和一群少年工同睡在榻榻米上，某個夜裡，他看到一條黑布朝他纏繞過來，驚醒之後發現原來是夢，鬆了一口氣。下一秒，三郎突然看見被調到名古屋的同伴秀男躺在旁邊，兩人相約到戶外走走，月光下秀男的手是透明的。緊接著，一聲巨響，三郎從夢中被叫



醒，是空襲。死亡對一個少年而言似乎異常遙遠，然而戰場上卻又距離死亡往往只有一線之隔，三郎曾經從圖書館員平岡的口中，聽過一則關於幽冥之國的神話故事，當時他問為什麼死神和夢神會住在一起？平岡君回答：

那是因為夢神和死神是夜晚的雙胞胎兒子呀。難道你不覺得，當一個人睡著的時候，跟死亡非常接近嗎？接近夢的狀態，也就是接近死的狀態。活著的人，只能藉由夢來模擬，或者了解死的狀態。死的美好，只有在夢裡才可比擬。（頁 167）

三郎不知道如何形容那種感覺，只覺得這個說法「太有魅力，太離奇」。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三郎是從自己的夢境進入秀男的夢，也就是說，他從秀男身上「好像被硬生生摔壞的一個瓷碗」以及「靈魂旋轉起來，以一種獨特的舞步」經歷一次死亡的過程。

凱西·卡露詩（Cathy Caruth）在〈創傷起航：佛洛伊德理論中的生存與歷史〉中以近年來精神醫學界熱烈探討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為始，<sup>23</sup>論述中開門見山指出，PTSD 並不單純只是來自毀滅事件的影響，還有一個最根本的肇因，那就是存活之謎（enigma of survival）。卡氏認為本世紀最具核心且複雜性，卻也最具爭議性的創傷論述非佛氏的「超越享樂原則」和「摩西與一神教」莫屬，並主張將兩部作品放在一起閱讀，才能貫通佛氏如何將個體創傷理論建構在總體人類生存創傷的獨特觀點上。她指出創傷實質上源自毀滅與生存之間似是而非的關係，因此也含蓋人類從歷史災難經驗中生存下來的心靈遺產，也就是「存活之謎」的神祕內涵。卡露詩針對佛氏在經歷第

---

<sup>23</sup>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Traumatic Departures: Survival and history in Freud.”, pp.57-72。此篇論述為探討生存之謎對 PTSD 的影響，全文重點在於作者主張將佛氏的《超越快樂原則》和《摩西與一神教》合併閱讀，強調唯有將個體創傷和歷史創傷放在一起討論，才能完全理解「生存問題」在人類經驗中的複雜性。

一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後，首次提出「死之本能」的概念，<sup>24</sup>並將不斷重返戰場的噩夢視為存活者受到死亡驅力的影響，因而企圖回到瀕臨死亡瞬間的那一刻，再次身歷其境地去感受那個未知的力量。卡氏進一步從中申論夢的創傷不只是存在夢境中，更多是從惡夢中醒來的經驗裡，另一個更詭異的說法是「創傷的再經驗」（reliving the trauma），也就是透過重回災難現場來確立自己的生存。

吳明益在唯一一節從第一人稱視角書寫三郎重返工廠舊址時，以另起單一段落的方式寫下：「而這些年我常常陷到關於戰爭的回憶裡，會不會是我的身體有哪個部分，其實是渴望戰爭的？」（頁 292）從邏輯上看，這是一個很悖理的想法，文中並沒有針對這個想法提出進一步解釋，筆者以為卡露詩主張「存活之謎」的說法，或許可以提供一個精神分析式的詮釋，將不斷回憶戰爭、回想死亡，理解為受到「死亡驅力」召喚的無意識過程，因無法真正了解而必須一再重返現場的心理症狀。此外「渴望戰爭」其實並非希望重燃戰火，而是「我們以天真的少年的姿態，學習並且參與了人類存在的殘酷性。」（頁 292），對於歷劫歸來的倖活者而言，戰爭除了帶來大量死亡，不可否認，也激發出人類的求生意志，只有通過與死神擦身而過的那一瞬間，才能真實體驗「存活之謎」的奧義，與其說三郎渴望重返戰爭，其實他渴望的是再次經歷「存活下來」的真實感。卡露詩結合佛氏理論提煉出從「存活之謎」探討戰爭創傷的獨特觀點，提供筆者思考三郎歷劫歸來後常常陷入戰爭記憶，甚至吊詭地渴望重回戰場的矛盾，其實是無法單從理性或道德層面進行詮釋，而是必須回到心理層面，理解其為一股重回死亡邊緣的趨力所使，同時也是再次體驗存活之謎的心理本能。

## （二）「夢中夢」之記憶串流

由於「夢」是在無意識狀態下進行的，因此表現在文學作品中，通常作為一

---

<sup>24</sup>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吳康譯：《精神分析引論新講》（臺北：桂冠，1998 年），頁 103-104。佛氏在闡述「超越快樂原則」中針對強迫性重覆症狀提出「死之本能」這個概念，說明生命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從無機物中產生出來，據此假設，本能必出現重新毀滅生命，復回歸無機狀態的傾向，並將此一破壞看成生命過程中不能缺少的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

種暗示或隱喻的功能存在。如前所論，小說中「夢」可視為填補記憶空缺的神祕途徑，此外，筆者亦發現作家企圖以「夢中夢」的方式進行記憶扣連，文中提到「我」在睡眠異常狀態下恢復作夢功能時，他開始記錄夢的內容，並對夢的虛實拋出探問：

我看著那些被我寫下的夢境，卻感到一種強烈的陌生感。那真的是「我的夢境」嗎？還是我潛入了一個陌生的世界裡，所窺看到的別人的夢境？而我不斷回想，夢境回來的時候，究竟生活裡出現了什麼決定性的事件？（頁129）

從上述引文可以得到一個訊息：「我」開始寫夢，巧妙的是，吳明益表現此一動作的方式並不在正文裡，而是安插在不同篇章中的一小節，像個休止符般短暫切斷故事的連續性，先簡短描述一段少年三郎的夢，緊接著立刻轉接到敘事者「我」的視角，寫下：「寫到這裡，我靜靜地醒過來」（頁45）作結。<sup>25</sup>作者似乎刻意將「我」抽離小說脈絡，或者說是一種隱喻的表現手法，暗示此部小說的內容其實是一場夢，換句話說，是「我」在自己的夢裡夢見父親的夢。

小說的第一個夢境是「石頭」被三郎抓住的時候，它正在做一個「脫去硬殼，長出翅膀的夢」，三郎即將搭船赴日的那天清晨，伊卡桑誤將烏龜當作一枚石頭，因此被拿去墊著床腳討個「穩住」的吉兆。「石頭」別無選擇當一隻床腳活下來，每晚頂著三郎父母沉重的身軀入睡，並發現伊們的重量會隨著夢境的重量而改變，同時也發現當自己處在夢境時，那些壓在背殼上的重量也會失去存在感。於是「石頭」努力讓自己進入睡眠狀態，並嘗試在夢境中潛入伊們的夢：

---

<sup>25</sup> 此外，在第16小節中，作者用同樣的手法先鋪陳一段三郎的夢，再以「在夢境回來的第二天，我寫到這裡，睡意像一群白鳥從遠方靜靜飛來。」（頁114）作結。第36小節只有簡短一句：「他們在等待什麼呢？」，似乎是對著前頁插放一張攝於高座海軍工廠前，一群少年工坐在窗台前的合照所提出的探問。

石頭最怕她（卡桑）在睡夢中流淚，那眼淚會像石頭一樣匡噹一聲打在床板上，有時還滲過床板、穿過石頭的背盾與腹甲、鑽入泥土，在地下與所有夢境的淚水滙聚成潛流。而當伊進入輕的夢境時，床的重量消失，石頭甚至感到身上出現一股奇異的力量，幾乎可以飛行。（頁 60）

吳明益從「石頭」的視角觀察人類的夢，將抽象的心靈世界轉換成具體的重量，沉沉壓在一隻失去自由的烏龜身上。筆者以為「石頭」可以視為人類歷史命運的象徵，支撐著無數個悲傷和快樂的心靈，而「所有夢境滙聚成潛流」的意象，則暗指所有夢境最後都通向人類無意識之源流。也就是說，唯有透過夢境才能進入無意識大海，也唯有在無意識裡才能拔去身上的重量，無怪乎「石頭」只能「閉起眼，等待睡眠帶領牠到夢境底層的夢境裡去。」（頁 61）

關於夢境與無意識之流的意象，作者進一步呈現在敘事者「我」一則詭異的夢裡。小說中「我」恢復作夢後，寫信給女友阿莉思關於夢的內容，描述十二隻袋鼠被兩位像是飛行員的男人所砍殺，被平整割下頭顱的袋鼠「眼珠帶著一點點的疲倦望著天空，一副剛吃完草的悠閒樣」（頁 230），反而還活著的袋鼠半閉著眼「彷彿正處於停留在非快速眼動期的無夢睡眠」（頁 230）。接著，男人把袋鼠的頭顱丟進冰湖裡，「那個湖像是為了迎接袋鼠的頭而流動起來，在接受了袋鼠的頭後又無意識地凝結。」（頁 230）夢境最後一幕是「我」穿上冰刀鞋，在袋鼠們的臉上滑冰。把上述夢境放在整部小說脈絡中，不難理解作者企圖將無夢的袋鼠投射在「我」身上，將冰湖影射為無意識大海，切下的袋鼠頭顱可解釋為「記憶」，因此湖水接受袋鼠頭的意象，象徵所有記憶終將滙入無意識之源流。「我」在承載人類記憶的無意識湖面上溜冰，意味著「我」能看見冰湖下每一張不同的記憶面孔，揭示記憶在無意識底層其實是交滙的，因此「我」得以在夢裡，也就是無意識裡與父親的記憶相遇，進而解理父親的戰爭經歷。

小說中「我」對於是否可能跳脫重複夢境提出疑問，白鳥醫師回答「夢境是神的疆域，而醫師與研究者不過是神跡的見證者」（頁 220），表達夢境和神域一樣無法被解釋，只能被經驗和見證。筆者以為《睡眠的航線》透過夢境企圖傳達一個概念，那就是歷史記憶存在人類無意識裡，無論在場或不在場都無法置身度

外。吳明益藉由「我」潛入父親三郎的夢，並透過父親的夢潛入「石頭」的夢，再從「石頭」的夢裡窺見三郎父母的夢，如此夢夢相扣串連起戰爭歷史的一隅，同時也揭開戰爭投射在不同世代心靈的創傷圖像。筆者以為吳明益透過夢境迂迴地再現戰爭歷史，並以「夢中夢」的方式進行記憶扣連，除了表明記憶如夢境般充滿神祕感與不確定性之外，更暗喻夢與夢之間就如同無意識大海，其實是流動的、相互套疊的，乃至於人類都在同一個夢境裡無意識地做著自己的夢，同時也無意識地流入他人的夢。

## 五、菩薩的眼淚：靈視人類的生存創傷

《睡眠的航線》中吳明益試圖從多重視角對歷史創傷進行不同層次的詮釋，如文中「Z」這位存在敘事者「我」夢境裡的角色，他描述「Z的眼確實是由無數個小單位所組成的，但卻不是規律的、蜂巢式的複眼，而像是將許多不同生物的眼所集合起來組成的眼」（頁280）。作者創造Z擁有特殊的眼睛構造，無疑是與人類只能從眼見為憑、向外單一視角觀看世界的侷限性進行比對。而超越以人為中心主義的敘事模式，並嘗試從生態觀點作為創作核心意識，向來是吳明益作品表現個人美學特色的著力點，《睡眠的航線》中的生態意識和宗教觀，便具體以宏觀視角書寫戰爭歷史的美學實踐。

### （一）存活、記憶與創傷

小說一開始透過竹子開花後集體死亡的現象，認為生物界生與死的循環生態，其生生不息的力量是來自基因趨力，在竹子的世界裡「不管是哪年長出的竹稈，只要竹鞭的年齡相同或相近，那麼開花的時間就大致相同，甚至有些竹子被移植到千里之外，也會跟原來的母竹林同時開花。」（頁21）吳明益藉由基因趨力表達死亡是一種不可抗力的自然力量，然而仍有幾顆倖存的種籽潛藏在泥土表層，等待雨季到來冒出新芽，並在敘事者「我」的睡眠異常症狀全癒後，重新賦予竹子死亡一個新的意義：「我會說，竹子開花就是為了要活下去，所以暫時以睡眠的形式等待機會。」（頁279），將夢境作為一種死亡的神祕想像，是人類模擬死

亡的唯一途徑，然而「竹子用幾十年開花一次的方法讓自己活下去。只不過那個「自己」的定義跟人類不太一樣而已」（頁 279），暗示竹子集體死亡其實只是一種表面現象：

不，我後又發現，竹子開花並不一定會全部死去，總有那麼一兩棵強韌地活了下來，它們會重新伸出竹筴，占領了那些沒有在死亡後迅速重生的竹子的土地。開花後沒完全死盡的竹子才是成功的竹子。（頁 279）

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我」從原本只看見竹子的死亡，經歷一場睡眠異常後，他觀察到的卻是強韌的生命力，筆者以為《睡眠的航線》便是用「生存」的角度探討戰爭的創傷記憶。吳明益在小說中不時透過敘事者「我」，針對戰後世代承襲歷史事件創傷的不解，企圖提出一種包容的觀看方式，像是「我」在經歷昏倒事件後寫信給女友阿莉思：

說起來我們都是沒有經過戰爭的人，我們根本不曉得戰爭是作麼一回事。但我們確確實實是曾經經歷過戰爭的那群人所生下來的一代。我們的父母、祖父母，都是經過戰爭汰選的人，不管是以殺戮他人來獲得自身生存的，還是以哀求、屈從逃過殺戮，或是用沉默、躲藏、謊言來避開殺戮的，那都是正確的生存策略。而唯有透過那些我們父母選擇的正確生存策略，我們終究得以被生到這個世界來。（頁 254）

引文中作者從「生存策略」的視角，對人類在戰場上為生存而進行殺戮的殘酷本能提出辯解，表明歷史不只是留下災難，還有一種更巨大的、超越個體或單一世代的——「存活下來」的意義。

邱貴芬評論《睡眠的航線》表達「既悲觀（『災難』與『戰爭』的不可避免）又樂觀（總有人會存活下來）」的人生哲學，<sup>26</sup>黃宗潔亦從「求存」觀點立論「看

---

<sup>26</sup> 邱貴芬：〈面對浩劫的存活之道：閱讀吳明益《睡眠的航線》〉，《睡眠的航線》，頁 14。



似卑微的竹子和水草，似乎提供了一種超越災難與死亡的可能性——就算世界被戰亂蹂躪成焦土，生命仍究會想辦法找到出路。」<sup>27</sup>充份說明吳明益用生命延續的觀點書寫戰爭歷史的創作意識。此外，作家筆下的「存活」除了演繹災難可能帶出超越死亡的哲學高度，另一方面也悖理地呈現創傷因存活下來而存在，甚至作為心靈遺產被無意識所繼承的無奈。如前所論，卡露詩企圖說明歷史創傷如何透過無意識力量，強勢地加諸在不同世代之個體心靈形成一股召喚，甚至是無以名狀的心理症狀，其中從災難事件中「存活下來」的事實，矛盾地變成啟動創傷存在的機轉。一如吳明益在小說中引用日本艦長哲田在戰後曾言：「有的時候活著比死去困難得多，因為要有耐心地等待死亡」（頁 286），表達出災難生還者帶著難以承受的創傷存活下來，他們在揮之不去的噩夢中，反覆經歷瀕臨死亡卻又幸運存活下來的驚恐。因而在小說中三郎一輩子活在戰爭陰影中鬱鬱寡歡，說明「存活」本身既是一種美意和祝福，同時也具有殘酷的一面。筆者以為這透露出作家的戰爭史觀，一方面藉由竹子的生存機制，影射人類從戰爭中求存的生命鬥志，另一方面也透過書寫人物的記憶傷痕，控訴戰爭造成難以平復的心靈浩劫。

## （二）人的慾望與神的兩難

不可否認「存活下來」對於活在烽火連天的世代而言，更多時候是一種運氣，三郎回想自己「受到觀世音的保佑而毫髮未傷回到故鄉」（頁 292），把自己平安歸來視為神明的恩典，呈現出人類處於災難中對生命的謙卑姿態。吳明益在小說中勾勒參戰人物內心對神的祈求，並進一步從「菩薩」的視角透視眾生祈求，在祈求與回應之間提煉出對戰爭歷史的省思。首先，三郎在前往日本的艦艇上，手裡握著母親向菩薩求來的護身符，他覺得軟弱但又充滿慰藉，同時伊卡桑正在「剛除完田裡的草，跪在田埂上，唸起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佛號」（頁 41）。在菩薩的大智慧裡「沒有任何痛苦與祈求是新鮮的，沒有出生和死亡不在預料當中，在菩薩面前一切都赤裸裸，人的身體變成玻璃，心在那裡熱滾滾地跳動」（頁 42），表達菩薩靈視人世間所有苦難與生死，然而祂仍只能「觀世間音」，然後

<sup>27</sup> 黃宗潔：〈遠方的戰爭：論《睡眠的航線》中的生態、夢境與記憶〉，頁 178。

將祈求儲存在那有如圖書館般深邃而複雜的內心。

作者企圖傳達菩薩對人們的祈求其實早已瞭然於心，正因為祂的廣大神通和慈悲，更讓祂只能痛苦地收藏每一個祈求，而不是應允每一個祈求。因為戰場上的另一方，哈普少尉坐在 B-29 戰機裡，他的任務是將燒夷彈投向雲下的城市，腦海裡跳針似的反覆出現上司的話：「每一次轟炸，都是你們在神的感召下對天職的獻身」（頁 147）。哈普少尉在「神的安排」下執行毀滅一座城市的任務，他的內心卻同時疑惑著「在超過萬呎的高空，你在最接近上帝的地方，只有上帝知道你發生了什麼困難。然而，上帝知道了又能怎麼辦呢？」（頁 148）哈普少尉的質疑其實也道出小說企圖藉由信仰的矛盾，進一步呈現人類面對生存安危時的脆弱與恐懼，卻又在摧殘世界的同時，以神為名求得一份心安，乃至於哈普少尉在進入投彈航道之前，仍摸摸胸前的十字架說了一句「阿門」。

針對三郎和伊卡桑的祈求，以及哈普少尉的禱告，作者表達菩薩的無奈：

菩薩珍視世人的祈求，但祂並不能實現祈求，只能收藏祈求。這是因為凡人的願望多半相互干擾、矛盾，隱含著傷害性。祂幾乎很難同時實現兩個人、兩個家族、兩個國家的願望，而不傷害其中一個；而菩薩如此慈悲，祂無法珍視一個祈求而傷害其它祈求，以致於祂決定珍藏所有以祂為名或不以祂為名的祈求。（頁 154）

即使是無所不能的菩薩，也無法同時實現處於敵對兩方的祈求，因為在應允「生存」的同時也必然應允「死亡」。當敘事者「我」來到曾毀於戰火的名古屋市，遇見一位從中國來的旅人王剛，提到中國曾用千手觀音菩薩像，跟日本交換了一座十一面觀音像的歷史，「我」的內心發出疑問：「一尊以十一個面向看著日軍對中國展開的殺戮，一尊展開著雕刻精緻的千手，待在日本泰寺裡束手讓名古屋陷入火海。牠們當時不曉得心裡在想些什麼？」（頁 253-254）吳明益透過角色的不同立場探討人類的求生欲望，並藉由菩薩的心聲，傳達戰爭讓人類陷入相互殘殺的暴行和矛盾，以至於連菩薩都對戰場上的死傷束手無策。

小說末章，敘事者「我」在母親的病房內，電視台正播報印度洋發生大海嘯

的不幸消息，新聞畫面中出現人間煉獄般的災難現場。南海大海嘯似乎離台灣很遙遠，然而大自然浩劫卻無疑是一種全球性的災難，全世界的人都感同身受地關注這則新聞。一句「戰爭結束了嗎？」道盡三郎擺脫不掉的夢魘，也是作者對此部小說拋出最沉痛的探問，戰爭早已結束，然而「戰爭的背後其實還有戰爭，而災難的背後仍將有災難」（頁 295）這也許是生而為人所必須承受的生存創傷，也是作者從戰爭歷史和生態災難中，企圖傳達對人類文明的省思。選擇從竹子開花後集體死亡開始，最後以印尼大海嘯的死傷作結，對照戰爭帶來生命消逝以及心靈創傷，可以看出吳明益並不打算在小說中對歷史提出批判，或者對身份認同進行詰問，而是試圖從更多元的角度對戰爭歷史提出不同的省思，並進一步從存活下來而無可避免的創傷宿命，逼視人類發動戰爭的荒謬本質。

## 六、結論

《睡眠的航線》以多元視角呈現戰爭歷史記憶，從敘事者「我」的觀點為主要軸線，穿插以全知觀點描述之父親戰爭經歷，並加入菩薩心象、烏龜夢境、植物生態、靈體 Z 等「非人」視角，三條分別從現實處境、歷史經驗和超現實世界出發的敘事線，在沒有接點的時空中平行發展。小說中透過三郎的回憶，羅織日治時期台灣少年至日本兵廠擔任少年工的歷史經驗，並藉由夢境書寫從潛意識重返歷史現場，企圖在客觀史料及家族生命史之外，深潛小說人物之心靈世界，以一種超越現實的思想高度，全面性探討戰爭對人類造成的創傷記憶。本文從精神分析視角出發，以「創傷敘事」為核心意識，探討作者如何透過夢境「記憶」和「再現」二戰歷史，並開啓第三個空間：神域和異界，讓殺戮戰場中缺席的「我」，與現實空間裡失蹤的父親，在無意識中滲透彼此的內心世界，引領讀者一窺少年三郎參戰期間的徬徨與恐懼，以及「我」如何理解父親的戰爭創傷，進而療癒自己的精神困境。

首先從父親三郎戰後所承受之身／心創傷開始，將耳鳴造成的沉默、失語視為一種心理症狀，因無法將經驗轉換成敘述而導致的創傷固著，以至讓記憶入侵現實生活產生失序和混淆。作者透過敘事者「我」慢慢拼貼出父親三郎的沉默形

象，並藉由竹子集體開花／死亡的意象，展現人類個體心靈與總體記憶之間的連繫關係。本文從佛洛伊德晚年致力建構的群體心理學研究找到切入點，將「我」的精神困境置於歷史記憶的大脈絡底下，探討父親的戰爭經歷如何透過無意識召喚，引領「我」為解決睡眠異常而踏上精神療癒旅程。作者安排「我」重返二戰現場，來到父親三郎曾經工作過的兵廠原址，並在「野鳥之森」一場意外昏迷事件中，無意識地經歷父親當年的心靈創傷，「我」的睡眠時間自此回到常軌。筆者以為吳明益企圖表達歷史事件終將成為過去，創傷記憶卻潛伏在整體人類之無意識中，在某個時代、某個角落、某個心靈，因某種契機伺機而出。

《睡眠的航線》是一部由夢境串連而起的創傷記憶小說，從敘事者「我」開始紀錄自己的夢開始，便已揭示小說內容其實是一場夢。作者採取「夢」作為敘事主軸之一，除了表達歷史非單一標準詮釋，並將夢視為填補斷裂記憶的一種隱喻之外，筆者以為必須回到佛洛伊德建構創傷理論的原點，從人類無意識層面，探討歷史創傷如何透過無意識的召喚、牽動甚至深刻影響著人類的心理發展。本文立論參戰者三郎的死亡夢境，實為受到「死之本能」及「存活之謎」的驅動所產生一種心理機制，並將「夢中夢」視為一種暗喻，表達個人無法置身於歷史之外，戰爭歷史必須被記憶，記憶創傷也必須被清理。戰爭將人類帶向死亡和毀滅，《睡眠的航線》逆向從「存活」觀點作為創作意識，從一開始描述竹子集體性交並死亡的意象，到文末敘事者「我」重新定義竹子開花最終是為了延續生命的新理解，不難看出作者企圖從自然生態奇觀中，詮釋個體生命的死亡其實是群體生命的延續。然而，筆者亦發現，吳明益的「存活」概念還含蓋另一層更深刻的創傷意識，由此可以看出作家試圖用一種包容的態度看待戰爭歷史，同時也藉由創傷書寫提醒戰爭帶給人類的心靈傷害。

生態觀和宗教觀是作者表達對戰爭歷史的獨特視角，企圖從宗教和哲學的高度檢視人性的脆弱和戰爭的荒謬，即使是無所不能的神，也無法同時應允戰場上任何一方的祈求。因此「人類能一代一代地活存下去，無非是這些苦與難維持了生與死的恆定」（頁 295），說明「求生」和「求死」對總體生命而言其實是一體兩面。小說最後以南海大海嘯新聞作結，敘事者「我」母親一句：「無知影伊寡郎尾仔是去何位囉？」除了對人類最終的死亡歸屬感到疑惑，也道出吳明益企圖

表明大自然和戰爭一樣都導致人間煉獄，戰爭已經結束，然而永遠都有下一場戰爭——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戰爭，正在某個角落悄悄蘊釀著。對台灣社會而言，殖民時代和戰爭早已結束，創傷記憶仍不斷藉由文學、藝術、表演等不同媒介，在不同時空下被重新詮釋，並從不同角度賦予新的意義、新的理解。筆者以為吳明益並不著眼於建構或解構戰爭歷史，而是藉心理創傷引發思考身為戰後世代的我們如何記憶歷史？用什麼態度面對戰爭創傷？如何清理上個世代遺留下來的未癒傷痕？這無疑是《睡眠的航線》拋出更引發深思的議題。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吳康譯：《精神分析引論新講》（臺北：桂冠，1998年）。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楊韶剛譯：《一個幻覺的未來：摩西與一神教》（新北市：知書房，2001年）。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彭舜譯：《精神分析引論》（臺北：左岸文化，2010年）。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臺北：二魚文化，2007年）。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Sigmund Freud, "The Freud Reader" (W. W. Norton & Co Inc. 1995).

### 二、期刊論文

朱惠足：〈從「戰爭的記憶」到「記憶的戰爭」：宋澤萊、陳映真與目取真俊的二戰記憶書寫〉，《文化研究》第十二期（2011年6月），頁13-44。

黃宗潔：〈遠方的戰爭：論《睡眠的航線》中的生態、夢境與記憶〉，《東華漢學》第13期（2011年6月），頁173-194。

### 三、網頁

Sandra L. Bloom, "Trauma Theory Abbreviated. 1999.", 網站：（[http://www.sanctuaryweb.com/PDFs\\_new/Bloom % 20Trauma % 20Theory % 20Abbreviated.pdf](http://www.sanctuaryweb.com/PDFs_new/Bloom%20Trauma%20Theory%20Abbreviated.pdf)）（檢索日期：2015年1月16日）

# Unconsciousness Recall And Memory Representation of War History ——The Traumatic Narrative in “Routes in the Dream” Based on Psychoanalysis Theory

*Chen, Hsiu-Lin*

Ph.D. student of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at the discussion on Wu Ming-Yi's first novel “Routes in the Dream”, examining how Mr. Wu represented the faraway war experience from the view point of postwar gener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r. Wu attempted to reveal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the catastrophic memories rather than writing a historical story. More yet, he put great efforts to include the spiritual and ecology perspectives to come out multiple versions to the war history. For this purpose, I utilize the Psychoanalysis Theory by Sigmund Freud to interpret how the unconsciousness call forth the war memories in the dreams to narrator “I” who even did NOT take part in the war.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nigma of survival” by Cathy Caruth to explain the soldiers surviving from the war were paradoxically eager to go back to the battle and dreamed about the horrible experience repeatedly, it is not completely associated to a reality or moral issue but exactly resulted from “the drive of death”.

**Key words:** Wu Ming-Yi, “Routes in the Dream”, traumatic narrative, Psychoanalysis, unconsciousness